



DAOTONG YUYI — BEISONG
ZHEXUE SICHAO YANJIU

道通于一

——北宋哲学思潮研究

李祥俊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B.J.J.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

DAOTONG YUYI —— BEISONG
ZHEXUE SICHAO YANJIU

道通于一

——北宋哲学思潮研究

李祥俊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通于一——北宋哲学思潮研究/李祥俊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2
ISBN 7-303-08094-5

I. 道... II. 李... III.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北宋 IV. B244.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578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 版 人: 赖德胜
印 刷: 北京昌平兴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 mm×210 mm
印 张: 17. 375
字 数: 460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 00 元

责任编辑: 饶 涛 美术编辑: 李葆芬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刷: 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联系本书编辑部: [wkb@bnup. com. cn](mailto:wkb@bnu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58802695 58802753
发行部电话: 010—58808015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联系我们调换; 读者朋友有任何见教, 也请不
吝垂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
青年项目“北宋哲学的学派冲突与问题争论”最终成果
(项目批准号: 01JC720004)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序言

北宋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正处于由三教鼎立到理学独尊之间的过渡阶段，儒、佛、道三教之间的会通与冲突达到了新的阶段，各派新儒学蜂起并就儒家学派内部的道统、经学、义理展开论争，呈现出媲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对北宋哲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也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哲学创新提供历史借鉴。本书以学术史为基础，从整体上对北宋哲学思潮作了梳理，但限于个人学殖和悟性，其中还有很多粗疏之处，现将写作的基本情况作一概述，敬请方家教正。

一、缘起

我之所以选择北宋哲学思潮作为自己近年来的研究课题，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拓展自身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认识到北宋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很多可以发挥的空间。

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以《王安石学术思想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对于北宋时期

的学术思想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这一研究的总体倾向是偏重思想史、政治史的。我自 1999 年博士毕业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工作后，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上有意识地向哲学靠拢，因此对北宋时期一些哲学上有建树的大家如张载、二程等人下了一些工夫。博士毕业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参加了《20 世纪学术全书·中国哲学》的写作，负责撰写《宋元明清哲学》，内容包括宋元明清哲学发展史和 20 世纪宋元明清哲学研究综述两大部分，写作过程很辛苦，但完成之后却始终未能出版，因为编撰《20 世纪学术全书》作为世纪末的一次学术大工程，最后不了了之。《宋元明清哲学》虽然没有出版，但却让我对这一阶段的哲学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算是入了门。当我思考自己下一步的学术研究计划时，我很自然地想到要在宋元明清哲学中寻找突破点。

现代的宋元明清哲学研究主要是以宋明理学研究为主的，这个调子大概是从南宋大儒朱熹起就定下了的。但在 20 世纪末期，国内学术界有关“宋学”的研究逐渐兴盛起来，它最初是从史学界发起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宋代的新儒学、新经学，目的是要突破传统的宋明理学、宋明道学一统天下的学术格局。“宋学”研究的中心实际在北宋，因为南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宋明理学已经占据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我的博士学位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攻读的，“宋学”研究的氛围对我的影响很大，也促使我重新审视北宋哲学，我认为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对于北宋哲学的定位需要重新调整。传统的哲学史大多把北宋哲学看作是理学哲学的前奏，我的思路是北宋哲学是可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相媲美的学术繁荣期，而南宋以降理学独尊则相当于汉唐儒家经学独尊。其中关键是如何看待三教鼎立到理学独尊之间的这一个过渡阶段，忽视这个过渡阶段，直接把三教鼎立看作是学术之分，把理学独尊看作是学术之合，这是简单化的思路。北宋时期儒家学说的兴起是一个艰

苦的精神奋斗的历程，各派哲学蜂起并相互论争，其中的曲折演进过程尚有许多未发之覆，而北宋时期的儒家学派与佛、道二教抗争，在理论思维上表现出很高的水平。我意识到北宋哲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值得自己为之努力。

我于2000年前后开始拟订写作计划，并着手收集材料，2004年前后开始对材料进行分析、整理，2005~2006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力写作。写作这样一部较为系统地阐述北宋哲学发展历程的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既需要提高学术修养、理论思维水平，更需要积累丰富系统的文献基础，虽然作了最大努力，成果仍然远不尽人意，只能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加以修正、深化，以期其渐臻完善。

二、方法

中国哲学史是西学东渐下的一门现代学科，可以说它的最初的研究方法完全是借鉴西方哲学的。创制中国哲学的那些前辈学者们往往持有一种信念，即中、西哲学有着共同的问题，只是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的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虽然所借鉴的西方哲学范式不同，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这就是用西方哲学的体系、问题来组织中国传统的学术材料。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融合、发展，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逐渐发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不仅在使用的语言上是不同的，它们各自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由之而构成的哲学体系也是不同的。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哲学还能叫哲学吗，国内史学界和西方哲学研究界的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而中国哲学史界的一些研究者也对自身学科的存在感到困惑。当然这又是一个老问题，当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写出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时，作为审查报告撰写人的金岳霖先生就已经质疑这究竟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

我认为,当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面临着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学术融通问题。哲学作为一个多样的表达方式、一个问题域,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哲学标准形态。西方哲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面貌,同样,中国哲学的建立也改变了哲学这一学科的面貌。今天的哲学已经不能局限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西方哲学系里的定义和说法,而要把它看作是全球化背景下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学科门类,其中固然有西方的渊源,但也无法脱离东方而单独存在。哲学是什么、如何研究哲学史,这不仅要遵循传统的规范,更要在中与西、古与今的对话中现实地展开。

就北宋哲学史的研究而言,我们可以用现代的体系、问题去组织传统的材料,用现代的语言翻译古代的概念,这也是近现代以来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但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更侧重于以现代哲学为背景,试图走进北宋时期中国传统学术内部,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它同样是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寻求一种视界融合。我们过去往往坚持着或中、或西、或古、或今的标准,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出现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感到困惑,以致产生认同危机。实际上这样的认同危机也不是什么坏事,而应当是学术研究以至人生百态中的常态,我们总想着认同是常态,认同危机是变态,其实认同的不断迁移才是存在的真相。

在现代的北宋哲学研究中,除了用现代哲学的框架裁剪传统学术材料这一弊端外,我认为还有几种研究方法也值得反思:一种是以社会发展史为基础,用生产力发展、阶级斗争作为哲学理论的直接依托,它把哲学发展历程放到历史的宏观视野中,寻求理论与生活的统一,但缺点是理论与现实靠得太近,缺少中介环节,容易导致简单化的贴标签;另一种是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就哲学概念之间的关系立论,它往往能够

揭示出淹没在大量史料中的哲学创造的精髓，但也容易走向“概念的游戏”，难以反映哲学思想发展的真实历史；还有一种是目前“宋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它比较注重考察学术思潮的演变，但限于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大多只是一种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虽然有些研究者自以为是在研究哲学，实际还是在用旧的哲学体系与传统学术思潮相结合。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注重以学术史为基础，尊重历史、依据文献，力图复活北宋时期哲学思潮的演进历程，这种方法和以理论框架组织史料、以问题意识选择史料的方法比较起来是很笨拙的，和从现时代的需要出发去诠释古代思想的方法比较起来更显得古板。但我认为这种方法更接近历史真相，也使其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的写法，其特色有二：一是它注重考察北宋哲学所赖以存在的传统的学术话语系统的变迁，而不是用外在的理论框架去整理古代材料；二是它关注北宋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不强求统一的哲学体系建构。

三、史料

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句话中的“只是”如果不作“全部是”而作“基础是”的理解，则是一句大实话。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夫，理论的总结就只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陈垣先生在论述史学研究时提倡对于史料的搜集要做到“竭泽而渔”，这种彻底的功夫我难以做到，但我在研究中力求做到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材料、尽可能深入地研究材料。

在传统的北宋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一些大哲学家的著述，如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等人的文集，广泛一点的史料来源则还包括李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非主流哲学家的著述和《宋元学案》等学术史著述。我在本书的写作中，除了研读上述史料外，还尽量搜集分布在传统的经、

史、子、集各部类中的哲学史史料，大量使用了《全宋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人笔记和经学注解中的史料，并尽力探讨了《大藏经》、《道藏》中的相关史料。这样的史料搜集、整理、分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但我认为是值得的，通过对大量的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史料的研读，对于北宋哲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三教哲学的论争历程有了不同于前人的理解。当然，在很多情况下，研读大量史料之后得到的结论和通过传统研究材料得到的结论是相同的，但其中的理论蕴涵要丰富得多，而且从严格的史学研究角度看，这个过程也是必需的。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也十分重视近现代的研究成果，它们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智慧结晶，一方面范导着本书写作的基本模式，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本书写作的重要史料来源。我认识到自己的史料搜集存在着两个主要的不足：一个不足是对北宋时期经学注解的研读比较少，另一个不足则是由于研读的粗疏与个人的成见造成对重要史料的遗漏。因此，我在研读近现代的北宋哲学研究成果时，有意识地考察其史料取舍，弥补自己在史料搜集上的不足，用他者的视角来矫正自己的学术盲点。

在本书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中，我感到自己还存在着一个极大的欠缺，即只能尽力吸收已有的史料整理、辑佚、辨正的成果，而无法进入对所引证史料的进一步的考证工作中去。作为一种严格的哲学史研究，这样做是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的，但限于个人的学术研究基础和写作时限，本书在这方面只能暂时保留遗憾，等待以后加以补充、修正了。

在学术研究中，史料的搜集离不开研究者的主观成见，两者是一个相互磨合的关系。一方面是带着已有的构思到浩如烟海的原始史料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论据，另一方面则要依据对原始史料的研读来不断修正、完善作为出发点的原初构思，这两个过程不断交互，逐渐达到一致。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更重

视以原始史料为本，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建构北宋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理论的概括最终是为了发现历史真相。当然，对于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不仅需要深入史料，同时也需要深入哲学，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时时提醒自己，要两面出击而不要两面讨巧，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

漆侠先生曾经谈到，他为撰写《宋代经济史》所搜集的大量史料在“文革”时毁于一旦，但他在“文革”后又从头开始，重新搜集史料。我想，这第二度的史料搜集是在作了相当的研究之后进行的，其所具有的理论眼光是初次搜集史料时所不具备的，对于写作的益处是巨大的。漆侠先生这种二度史料搜集工作是“文革”带来的不幸，但就其最终成就来说，这种不幸未尝不是上天的“福佑”。我有时候想，如果我遭遇漆侠先生那样的磨难，我是否还有毅力从头再来，这个过程的漫长、艰辛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与诱惑，恐非我所能克服，这是我所深感惭愧的。我们不会再有老一辈学者的曲折经历，但也因此缺少了学术创作中的因磨难而带来的丰富蕴涵。

四、结构

北宋哲学是一个历史的存在，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大全，任何一种史学研究都只能是站在现代立场上的叙述，追求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近似再现、适度诠释，本书的写作也是要寻找一种自己的再现图景、诠释结构。就近现代的北宋哲学研究成果来看，在叙述的结构上大致有按人物、按学派、按问题等不同的写法，都有助于呈现北宋哲学的历史真相。而本书在结构安排上也有自己的思考，即把北宋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但不是北宋哲学概论式的写法，而是一种对哲学发展历程的总体性梳理。

我在研究北宋哲学时有一个信念，这就是我相信北宋哲学的历史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由不同的声音共同构成的大合唱。

北宋时期的哲学家们的研究与创作并不是孤芳自赏式的，他们使用的学术话语是在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前后连续的。他们在和传统对话，承续传统也重新诠释传统，在述中求作；他们相互之间在对话，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形成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态势；他们也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话，在理想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知与行的碰撞中点燃思想的火花。而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的任务就是寻找出他们共同的话语系统、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并进一步揭示出由此而形成的这个时代的学术发展脉络，这就是北宋哲学思潮研究的意义所在。

要寻找北宋哲学的发展脉络，建构起内在的叙述结构，不能借助于外在的理论框架，也不能无根地诠释，必须深入到历史深处，从原始史料本身出发，对古人的思想作真切的同情的理解。我采用的方法是归纳法，通过仔细研读搜集起来的原始史料，从中逐渐归纳出北宋时期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的问题，再以这些问题为基础，整理出几个主导性的问题域，最后以这些问题域为依据，组织本书的结构。当我最终摸索到北宋哲学中判教、道统、经学、义理这四大问题域时，我有一种直觉，我已经摸到了北宋哲学思潮的脉络。当然，这样寻找叙述结构的方法是很辛苦也很笨拙的，但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在本书中采用判教、道统、经学、义理这四大部分作为叙述的主体结构。判教探讨的是学派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对北宋时期儒、佛、道三教之间相互批评、相互会通的论述作了尽量详细、系统的梳理，从中概括出北宋哲学发展的趋势，即新儒学思潮的兴盛与三教学术格局的重新确定，由传统的三教鼎立发展为儒学的独尊。道统探讨的是儒家学派内部圣贤谱系的重新建构问题，通过考察北宋诸儒关于孔子、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等前代大儒的评价，以及北宋诸儒相互之间的评价，揭示新儒学道统建构的曲折过程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儒

学价值评价标准的转换。经学是儒学知识形态的主体，是儒学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北宋时期儒家经学正处于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型，北宋诸儒对于五经、四书都有丰富的注解、评价，从中可以反映出儒家经典文本的范式转换与经学解释方法的变迁。义理探讨的是北宋时期以儒家学派为中心的哲学根本问题，通过对北宋诸儒有关一道德、天人关系论、仁论、礼论、人性论、本体论、为学之道、价值观等的系统研究，提炼出北宋新儒学思潮的核心精神，揭示出其在借鉴佛、道思想基础上对传统儒学所作出的创造性发展。

我把北宋哲学思潮的总体发展脉络概括为八个字，即“三教论争、儒学复兴”。承续南北朝隋唐的学术传统，三教论争仍然构成北宋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辟佛、老的新儒学思潮逐渐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就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内部分析，又可以划分出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一种是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改造，北宋前期、中期的柳开、欧阳修、李觏以及“宋初三先生”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一种是既批评汉唐儒家经学，又注重借鉴佛、道以发展儒学，其代表人物为周敦颐、邵雍、王安石、二苏、张载、二程等人，他们构成了北宋后期的新儒学思潮。而北宋后期新儒学思潮本身又可以以对佛、道的态度划分为两派：一派以周敦颐、邵雍、王安石、二苏等人为代表，注重会通，往往在终极存在、终极关怀论上皈依佛、道；一派以张载、二程为代表，力排佛、道，着力阐发先秦孔孟儒学真精神，他们是北宋新儒学思潮的中坚，属于狭义的道学思潮中人。

就本书的结构安排而言，儒家哲学占据绝大部分，这并非出于个人的学术成见，而是北宋哲学思潮的实然。佛教自东汉以来逐渐蔓延中国，其中兼含文化与种族两种成分，南北朝时期，皈依佛教的诸胡民族入主中原，成为驰骋沙场的英雄主体，而到了隋唐之际，经过几百年血雨腥风的洗礼，驰骋沙场

的英雄主体已经逐渐出自于传统的中原民族了。这样一种英雄的转换同样出现在文化战场上，像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文化上的英雄比沙场上的英雄整整迟生了一个朝代，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哲学史上的英雄大多出于佛门，但到了北宋时期，这个局面结束了，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的巩固，科举制度的规范化，文官阶层的兴盛，使儒学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他们的主体性得到发扬，实践理性、道德意识得到强化，儒学的复兴构成了北宋哲学思潮的必然趋势。

五、旨趣

本书是一部力求严谨的哲学史著述，力图把北宋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出来。本书的考察主线索在于，北宋时期的新儒学思潮是如何在三教鼎立的学术格局中，通过对佛、道二教的批判，对传统儒学的道统、经学作出新阐释，整合力量，在哲学核心问题上作出新的解答，从而实现儒家学说的复兴与创造性转换。本书的创作旨趣在于彰显北宋新儒学思潮的历史演进，但在揭示这种历史演进的叙述上采用相对客观的尊重历史真相的态度，从而和自南宋以来的有关北宋新儒学思潮的历史梳理方式拉开距离。

从南宋以来，对于北宋时期各派哲学相互会通、相互论争的历史考察就已经受到了遮蔽。朱熹作为旷世大儒，不仅是北宋新儒学思潮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宋新儒学思潮作出了系统的历史总结，他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等著述，系统梳理了北宋新儒学思潮的历史演进、思想探索，既展示了儒学自身的发展历程，也从理论上清算了异端学派。但朱熹的总结是以自身的学术取向为出发点的，他以周敦颐、二程、张载为直接孔、孟之后的儒学道统传人，只关注编排北宋时期儒家学派自身的圣贤谱系、学术渊源、理论建构，而把当时复杂的三

教冲突、新儒学思潮的内部论争仅列为辅助背景。

朱熹对北宋新儒学思潮的历史总结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成为其后的元、明、清各朝关于北宋学术的主流结论，儒家学派所编写的各种道统录、性理之学基本不出朱熹所确立的基调。明清之际的大儒黄宗羲编撰《宋元学案》，其基本思路同于朱熹，全书在叙述宋元学术发展时只列儒学而摒弃佛、道二教，以张载、二程之学为主干，把张、程之前的北宋诸儒统统看作是为张、程之学出现提供条件，张、程之后的北宋以至其后各代的儒家学者都是张、程之学的传承者，而把与张、程并世而立学术取向不同的王安石、苏轼学派打入异端，只列为附录。近现代的北宋哲学研究中，朱熹所奠定的研究格局仍然得到了延续。新中国成立前后以社会发展史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有突破朱熹以来的传统研究格局的趋势，但随着其后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僵化，这种趋势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民国时期的北宋哲学研究大多继承朱熹的传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北宋哲学研究趋势是回归民国以来的传统。而目前较为流行的“宋学”研究，由于受到研究的领域和理论思维深度的局限，都还远不足以抗衡朱熹的传统。

本书对北宋哲学思潮的研究还很粗疏，研究视野也有自身的局限，但却试图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北宋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丰富与深化朱熹《伊洛渊源录》、《近思录》所确立的北宋哲学研究格局。本书把北宋哲学思潮看作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自我奋斗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是曲折与艰辛的，是学派冲突与问题论争相互交织的矛盾统一体。朱熹在梳理北宋哲学发展历程时作了清洗，他从服务于现实学术斗争的需要出发，去除北宋哲学发展过程中无益现实的葛藤缠绕，这样做就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战斗历程本身的曲折、艰辛。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朱熹是面向未来的，他对北宋哲学思潮的梳理是一种哲学创作式的，他之所以清洗北宋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目的

是要纯化儒家哲学自身，投入到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新的战斗历程中。而我是面向过去的，我对北宋哲学思潮的梳理是一种历史再现式的，是对学术发展真相的一种探寻。我所做的工作只是对朱熹北宋哲学思潮总结的一个补充，当然这个补充也自有其价值，认识过去同样有助于开辟未来，艰辛的战斗历程应当包容在下一场战斗之中，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与展开。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判教	1
第一节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2
第二节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对道家、道教之学的批判	20
第三节 北宋时期的三教合一论	37
第四节 北宋时期的儒、佛会通论	52
第五节 北宋时期的儒、道会通论	65
第六节 北宋时期的道、佛会通论	77
第七节 北宋时期的尊佛论	82
第八节 北宋时期的尊道论	94
第九节 北宋学者论诸子	100
第二章 道统	111
第一节 北宋诸儒论孔子	112
第二节 北宋诸儒论孟子	126
第三节 北宋诸儒论荀子	162
第四节 北宋诸儒论扬雄	174
第五节 北宋诸儒论王通	186
第六节 北宋诸儒论韩愈	190
第七节 北宋学者论前代诸儒	201
第八节 北宋诸儒自评与互评	213
第三章 经学	257
第一节 北宋诸儒《易》学观	258
第二节 北宋诸儒《书》学观	277
第三节 北宋诸儒《诗》学观	287
第四节 北宋诸儒《礼》学观	294